

“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史观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朱 军^{1,2}

(1. 云南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云南 昆明 650091;
2. 北京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四个共同”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史观的系统性概括和总结,吸收借鉴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共识性成果,是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观、中国历史的整体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发展观,其在确立历史的主体性、揭示文明底蕴和探寻历史规律等维度上,对于新时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史观;多民族国家建设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7.008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系统阐释了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1〕}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结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到“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2〕}首次把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作为党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3〕}这反映了党和国家从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书写连续性的历史篇章,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提供民族命脉绵延不绝的文明叙事。“历史观就是对文明时间和历史叙事的组织方式,而对时间和叙事的组织方式,为一种文明的经验和思想赋予了可持续的意义。”^{〔4〕}本文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涵、特征与主要内容,全面阐释新时代以“四个共同”为

作者简介:朱军,法学博士,云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研究”(21VMZ014)的阶段性成果。

核心叙事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及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四个共同”与中华民族史观的逻辑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主旨鲜明地指出,“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正确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必然逻辑,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5]那么,“四个共同”是否可以用来概括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史观的全部内容呢?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态的历史观,它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什么关系,与中国传统的史观和域外的舶来史观又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自“四个共同”的理论话语提出以来,针对“四个共同”与中华民族史观的逻辑关系,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是“核心内容说”或者“超越创新说”。这种观点认为“四个共同”是中国共产党新时代中华民族史观的最新概括和系统阐释,可以作为一个统摄性理论,解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成结构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一体性。严庆等人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内容,是结构的‘四个与共’与过程的‘四个共同’的交织互映,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一体性。”^[6]王延中认为:“四个‘共同’既是把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从历史中国到现实中国一以贯之的中国史观,也是系统全面看待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发展史观,更是坚持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整体史观。”^[7]于玉慧、周传斌立足于“阐释的新向度”这一理论认知,认为:“‘四个共同’立足于历史的整体性和民族关系的互构性,从历史过程出发,超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共时性的结构论认知及其关系描述”,“‘四个共同’强调中华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主体理念,是对‘汉族中心论’和‘汉族核心论’的超越。”^[8]

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这种观点认为“四个共同”的思想核心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同时加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关思想。周智生、李庚伦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是‘四个共同’理念的认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共同’理念,其思想内核就深刻贯穿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重在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整体性这条认识主线。”^[9]陈育宁写道:“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国各个民族交融汇聚的多元一体,它历经考验,牢不可破,起决定作用的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这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国历史的基本特征。”^[10]这个论说包含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的发展史观与“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11]的观点。苏航进一步分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动力的解释,他认为:“多元一体理论就以‘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汉族核心论’和‘网络中国观’为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文化的多元性与现代中国的政治一体性提供了统一的基础和机理,为中华民族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搭建起了牢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理论架构,完成了对民族主义的超越。”^[12]

三是“综合体系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史观是多方面综合性体系,远超出“四个共同”的内容,不仅包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还包括了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理论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青觉认为:“新时代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简言之,就是要认识把握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走向上的统一延续性、历史发展格局上的多元一体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动态连贯性、历史发展动力上的人民主体性。”^[13]赵天晓、彭丰文在整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会议、讲话、文件资料的基础上,指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中华民族整体史观、发展史观和多元与一体相结合的辩证史观。^[14]王文光等人结合“四个共同”所蕴含的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思想,勾勒出与时空有关的四个维度,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

展,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统一和发展的国家、社会价值观念中的大一统和文化观念中的华夷共祖。^[15]此外,还有李大龙、林超民、潘先林等人借用方国瑜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把中华民族史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之中,从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地理、文化、经济与政治等结构性关联),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16]

中华民族历史观是涉及中华民族的内涵、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历史演进与未来发展趋势的总体性认识,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上述有关中华民族史观研究的观点综述,总结起来集中关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作为历史主体性与历史演进对象的中华民族是什么?在中华大地生活的人群、民族及其与作为整体性表述的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二,如何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如何从发生学上追溯中华民族孕育、成长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第三,中华民族演进发展的方向及其凝聚的动力机制和作用因素是什么?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四个共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史观的标志性话语,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极大的包容性,融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中国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史观的共识性研究成果,因而,也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综合体系。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继承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思想,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史观的集大成者;第二,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指导之下,又有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内涵、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凝聚动力的创新性论述与思想发展,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阐释新向度”;第三,强调各民族的共同性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是对传统中原王朝史观的“中心—边缘”不对称叙事和域外各种“汉族与少数民族”“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二元对立叙事的一种超越和突破,真实客观反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二、“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史观的主要内容

(一) 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观

“四个共同”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统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涵,明确中华民族的实体性与一体性。马戎曾梳理总结 20 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史叙事存在的两种传统,他认为:“这两类民族史传统在主要思路的差异,就在于是否承认并正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存在。”^[17]究竟以“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是“‘中华民族’的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决定了中华民族史叙事的线索与逻辑。尽管费孝通先生在 1988 年就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但是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前夕,中国民族学界仍然还存在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民族复合体抑或民族实体的争论。针对这些学术争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对中华民族的概念给出了科学的解答。

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8]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从共同体的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贯穿着‘多’,它不只是一个口袋,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主线,是方向。”^[19]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是土豆与土豆口袋之间的关系,不是作为总称的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具有共同体属性和实体属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和实体属性的强调,逐渐推动党和国家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并把其确定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

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明确新疆工作要“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20]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1]同时,该会议首次从观念和意识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作出界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2]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就在于“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23]

对于一个民族实体而言,民族认同意识位于民族共同体存续绵延和演化发展的核心,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关键标志。“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的认同感和一体感是这个社会实体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即一般我们所说的民族意识。”^[24]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实体的客观存在,就在于各民族已经形成了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才能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25]同时,“四个共同”也从“国家民族”的视角,勾勒和描画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包括共同的疆域、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精神,多个维度指向了现代多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历史文化与精神认同等几个关键性要素。从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观来看,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不是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和总体性称呼,不是一个近代汉人知识分子“希望倚靠国家力量凝聚各民族的认同感”的虚构性概念。^[26]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加上‘共同体’三个字,不是同义反复,而是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27]

(二)中国历史的整体观

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过程中,孕育和壮大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早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可以说,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28]这里着重强调了“多民族”是中国国家统一与历史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重要优势,“多民族”对于中国历史的不可或缺性。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了中华民族史观的整体性,以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大视野,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9]

中华民族作为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所有人群与民族的总和,共同作为历史的主体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历史和辉煌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人口载体,在古代是‘天下之人’,在现代是‘中华民族’。”^[30]如何认识中华民族的诞生、成长与发展并凝聚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如何认识不同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和管辖疆域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56个民族及其生活的疆域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作为一把钥匙,深入揭示了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并汇聚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核心密码。

首先,中国领土范围内的56个民族都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多元人群历史演进的结果,他们之间频繁地交流互动、吸收借鉴、分化融合,这种有机联系构成了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历史的事实前提和客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说:“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这些民族经过诞生、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31]“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

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32]从先秦之时的“五方之民”、秦汉以后的“胡汉一家”“华夷一体”，直到近代革命逐渐觉醒和社会主义时期自信自强的“中华民族”，都表明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的主体性和连贯性。

其次，各民族共同追求“大一统”的天下观，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和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的深层次精神动力，这也是理解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关键。域外各种史观对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关系、边疆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政权之间关系、中原王朝政权性质的误读或者曲解，均因为对中国的理解缺乏历史纵深和文明大视野。2022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精辟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33]他又讲道：“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34]只有读懂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才能读懂中华民族是什么以及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

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主体性，是不能通过西方的民族主义叙事或者“由帝国到民族国家”的逻辑进行诠释和解读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依然需要在传统的‘天下’语境下进行分析，才能更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实际。”^[35]“‘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这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钥匙。”^[36]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中国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时讲道：“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37]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大一统的传统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38]总之，历史上政权的“统一”或者“分裂”、民族之间的“冲突”或者“战争”，都不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无论中原王朝政权还是边疆地区的地方政权，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是天下秩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最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赋予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可以超越地域、族群、种族、宗教等单一要素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和培育统一的民族精神奠定了文明根基与历史基因。“以文化认同而不以血缘差别来界定居民身份，这正是中华古代民族观的血脉。”^[39]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四个共同”时讲道：“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40]“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41]这种内嵌和依托于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日益壮大与发展，也实现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演进。

（三）唯物辩证的发展观

中华民族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唯物辩证发展观，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为客观看待中华民族内部多元民族的互动与交流提供了科学指导。“从哲学意义来讲，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42]从唯物辩证发展观来看，中华民族内部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是同化或者竞争的关系，而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关系。“四个共同”内含唯物辩证发展观，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唯物史观来看,肯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历史地位。“四个共同”以各民族作为共同主体的历史叙事,从开拓疆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和培育精神四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历史地位,强调各民族均为创造中华民族历史作出了重要和突出的贡献。从这一点来看,“四个共同”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贯指导思想,“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观为指导,从民族平等的立场、观点出发去研究历史上不平等的各民族,承认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所共同创造,中国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43]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的创新之处,还在于肯定“各民族平等主义”叙事的同时,以“共同性”作为联结和纽带,强调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历史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从而超越了单一族别叙事和传统民族关系的叙事逻辑,为建立一种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提供了科学指导。

第二,从群众史观来看,确立各民族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群众史观,重视构成社会互动与历史实践的人的活动的利益主张与总体规律。历史创造的主体不是王侯将相的运筹帷幄,不是英雄人物的叱咤风云和纵横捭阖,而是广大的各族群众的普遍和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传统的中原王朝史观通过官修史书确立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边疆政权处于边缘,从而形成了“化内—化外”相区隔和不平等的历史叙事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就是“坚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44]从群众史观出发,才能正确评价各民族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的贡献。在领导和组织各族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地运用群众史观看待各民族在伟大祖国建立与建设中发挥的主体作用。群众史观才能真正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在近代的大觉醒和广泛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45]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近代革命与建设的社会实践历程,从根本上推动中华民族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型发展。

第三,从辩证史观来看,运用多元一体分析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多元一体辩证史观阐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相结合的基本结构,揭示了中华民族由多元聚为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实质上也就是研究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理论。”^[46]“四个共同”概要总结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内在动力与历史线索,“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47]以此观之,解释多元的民族汇聚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需要关注日常社会场景中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需要从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心理等诸多的互动层面,深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性要素生成的机理。“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重建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史中的民族互动交融史……最重要的是不同民族交融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要素的过程。”^[48]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细节与互动网络,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合理探寻与传递共享性的民族集体历史文化记忆,从而增进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历史情感。^[49]

三、“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史观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立基于中国民族史的共识性研究成果、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时代结晶,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与书写提供了科学方法指导。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的巨大影响主要在于提供

了科学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四个共同”通过传达历史认知、传播历史知识与塑造价值取向,为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文化资源,从而有助于指导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建设。

(一)明确“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历史的主体性,从根本上确立了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国民身份与价值理念

“四个共同”从历史维度揭示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进程,科学回答了“谁是中国人”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主体性的根本性问题。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共同体建设,这关系到谁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以及如何定义这个共同体的国民特征和共同要素的问题。亨廷顿提到,“国民身份、国家特性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常有的特点。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50]“四个共同”把开拓统一疆域、书写共同历史、创造灿烂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历史主体明确表述为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从国民身份上保障了各民族成员的平等性和政治体系对所有民族成员的包容性,从而解决了“谁是中国人”的根本性问题。以中国公民身份作为标志性纽带,中华民族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51]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核心要素,不是宗教、族群、文化、种族等单一排他性要素,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观念。

“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蕴含和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观,这是指导中国进行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从殖民主义开启世界体系以来,世界处理民族问题的价值理念,主要有种族主义、同化主义、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52]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内含进步文化观和积极发展观的“多元一体主义”的原则,^[53]体现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流动性融汇增长原理”,^[54]构成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性价值准则。“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史观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为演进线索,以“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作为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运行机理,科学揭示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这种历史逻辑凸显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和内生性,也为理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法定位和国家属性提供了合乎历史发展的正当性解释。

(二)揭示中华民族的多元内涵和文明底蕴,从历史维度阐述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现代属性和文明属性

“四个共同”根植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演进作为结构性解释因素,从而突破了西方民族国家范式以及民族主义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书写,为解释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现代属性和文明属性提供了历史依据。中国历史一直保持统一性和整体性发展,“它的基本特点是,在中国历史上始终保持着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即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55]“四个共同”生动揭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中原王朝与地方政权”的有机关联与互补交融,均蕴含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之中。

在理解现代国家的本质属性与要素构成上,西方现代化视野中的民族国家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国家,是一种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这构成了现代国家的本质属性。但是,民族国家是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语境,本身带有一定的规范性内涵。马德普指出民族国家观念主要是西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精英们在西方历史语境中形成的一种政治理想。^[56]这种规范性的政治理想,包含理想状态下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的一致性和通过代议民主的形式组织国家

政权。^[57]“四个共同”突出强调了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属性,强调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表明多民族国家才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原点。多民族国家深刻影响到中国国家的现代属性:构建了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族集体权利保障体系,以“五个认同”为内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路径,还有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目标的人民主权的推进策略。^[58]

“四个共同”强调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文明逻辑的论证。西方国家大多经历了由“殖民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这使得域外研究者往往以“帝国扩张”“殖民侵略”“征服王朝”等视角看待王朝中国的国家形态与近代转型。“四个共同”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与一贯性,国家政治体的演进与文明体的发展具有同构性。追求天下秩序之下的大一统是各个民族及其建立政权的共同追求,民族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地方政权与中原政权的对立与割据,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与文明绵延,中国疆域版图的扩大是大一统实践的结果,也是中华文明不断濡化与认同的结果。这深刻影响着近代以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与转型。“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它基本上是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一个历史过程。”^[59]同时,“四个共同”集中体现了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文明特质,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60]这为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赋予了文明属性,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中华文明的底色。

(三)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叙事及其历史规律,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与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61]“四个共同”从中华民族大历史的视野出发,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共同性叙事,揭示了多民族、多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动力与要素,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互动关系,以及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内在机制等历史规律,为正确认识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和方向,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有机结合,以及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提供了方向与指引。

“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62]“把多民族当做‘包袱’,把民族问题当做‘麻烦’,把少数民族当做‘外人’。这些思想都是错误的,不仅背离了客观事实,也不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大势。”^[63]“四个共同”从“各民族平等”的立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分析,指出各民族都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有助于消除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思想言论的负面影响;同时进一步揭示了多民族、多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一体发展的动力和要素,也为新时代更好地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和推进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依据。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中,始终贯穿着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线索,中国的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紧密关联、互动交织。作为较早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的学者,谷苞指出:“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又为发展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保证。”^[64]“四个共同”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历史、文化与精神等核心要素的形成与演变,揭示了各民族在伟大祖国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系统阐释了天下秩序之下的国家统一为各民族交流互动提供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塑造了各民族崇尚和平统一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精神。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紧紧围绕“五个认同”核心内容,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观念来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的生成,根本性动力在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共同性源自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情感等方面的有机联系,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观念和对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共同性的增多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些共同性包括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文化共同性和社会共同性等。”^[65]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把“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作为重要原则,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66]“四个共同”指明了历史中国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凝聚和认同的共同性要素,构成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也为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历史规律的参考。正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者所言,“撰写《三交史》的目标,就是将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那些民族、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的趋势作为关注的重心揭示出来。”^[67]这为中华民族与国家政治体关系的因应协调提供科学阐释,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改进与创新提供参考。

四、总结

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系统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之间的互动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具有内容的丰富性和体系的开放性,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形成规律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汇聚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客观描述,集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史长期研究的共识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有机和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对“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科学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华民族演进的大方向以及民族工作的施策重点,从而与时俱进且又富有创新性地推进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历史资源和精神动力。

注释:

- [1]“四个共同”是指“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参见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 [2]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 [3]《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国民族报》2021年11月5日。
- [4]杨四代、杜娟:《察古今之变: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兼论中华民族历史观形成的知识社会学基础》,《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 [5][27][51]《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第8、4、2页。
- [6]严庆、孙铭晨、王跃:《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民族学刊》2023年第3期。
- [7]王延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 [8]于玉慧、周传斌:《“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阐释的新向度》,《贵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
- [9]周智生、李庚伦:《以“四个共同”为核心: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7期。
- [10]陈育宁:《中华民族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 [11][24]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下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21、512页。
- [12]苏航:《“汉族中心”还是“汉族核心”: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新探——兼评新清史的内亚王朝史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
- [13]青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前线》2022年第8期。

- [14]赵天晓、彭丰文:《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及其重大意义》,《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
- [15][42]王文光、胡明、马宜果:《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研究论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 [16]李大龙:《“天下”视域下的“中国”与“边疆”——在“历史上的中国”讨论基础上的新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林超民:《中国历史整体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潘先林、谭世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基石——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研究之一》,《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
- [17]马戎:《如何思考和理解中华民族史》,《青海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
- [18]《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进步重要论述综述》,《人民日报》2021年8月25日。
- [19][62][6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30、22、22页。
- [20]《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
- [21][22][23][66]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25、327、326、328页。
- [25]马戎:《如何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环球时报》2023年11月3日。
- [26]杨念群:《皇帝的影子有多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7页。
- [28][31]习近平:《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9页。
- [29][32][37][40][45][47]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精神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21年,第6.4、4.5-6.6、6-7页。
- [30]关凯:《历史观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
- [33][34]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 [35]李大龙:《“天下”视域下的“中国”与“边疆”——在“历史上的中国”讨论基础上的新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 [36]李大龙、王珏:《“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3期。
- [38][4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 [39]林超民:《中国历史整体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 [43]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研究基本特点和发展三阶段》,《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 [44]谷芭:《民族研究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页。
- [46]邱立:《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核心理论——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民族研究》1999年第5期。
- [48]冯建勇:《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 [49]海路、杨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内涵、价值与实践路径》,《民族研究》2022年第4期。
- [50][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1-12页。
- [52]周少青:《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民族交融发展道路》,《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 [53]王希恩:《再倡“多元一体主义”》,《学术界》2018年第8期。
- [54]马俊毅:《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多元一体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2期。
- [55]潘先林:《融通“自在”与“自觉”:“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新解——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之二》,《思想战线》2022年第5期。
- [56]马德普:《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期。
- [57]李怀印:《现代国家的形成(1600-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 [58]朱军、孙吕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式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创新》,《学术探索》2023年第12期。
- [59]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 [60]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37页。
- [6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 [64]谷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 [65]何星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奠基之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 [67]李鸿宾:《我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认识和理解——兼谈〈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之意涵与特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5期。

[责任编辑:刘姝媛]